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戚迪明[1]，张广胜[2]

（1. 衢州学院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浙江 衢州 324000；2. 辽宁大学 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从空间隔离角度考察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居住空间隔离效应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城市，社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居住空间隔离对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呈显著负向影响，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均呈显著影响。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应注重降低农民工与市民的居住空间、职业空间和社区空间隔离，通过空间融合促进城市融入。

关键词：空间隔离；城市融入；农民工；身份认同；定居意愿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7)02－0081－10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但由于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就业、生活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农民工就业集中于收入低、保障低、工作环境恶劣的非正规部门，由于生活成本原因往往居住于城市周边的城中村乃至建筑工地等工作场所，业余生活及娱乐休闲活动匮乏。这些差异造成了两类群体在城市物理、社会空间上的隔离。物理与社会空间上的隔离不仅体现在农民工与市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更体现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使得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被不断拉大，同时由于隔离使农民工群体易受空间的剥夺，出现与城市市民阶层的对立[1]。而社会距离的拉大与市民阶层的对立可能会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带来消极影响。因此，从空间隔离视角分析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外对空间隔离的研究起始于社会学，并将空间隔离表述为社群隔离，认为空间隔离是产生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2]，地理孤立加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Pagnini 和 Morgan 通过移民职业隔离、物理距离与结婚对象之间的选择关系，发现在职业和种族之间有很强的对应关系[3]。同时，Timms 也发现人群之间的空间距离对于个体的公众认同和阶级归属感有重要影响[4]。城市空间与外来人口的研究起始于城市空间与特定群体尤其是城市弱势群体，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城市低收入群体或贫困居民的空间测量、空间分布以及与城市其他群体在居住、生活和购物等空间上的差异[5-7]。对农民工城市空间隔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部分研究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居住的隔离程度进行了测度[8-9]，而多数研究集中于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上，张子珩、杨莉认为城市融入与外来人口和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有关，混合居住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10]。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空间隔离导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

收稿日期：2016－12－20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7.02.0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17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4YJC790094)；辽宁省特聘教授支持计划(2013－49)；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WT2015009)

作者简介：戚迪明(1979—)，男，浙江余姚人，衢州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Email：35576283@qq.com。

离拉大,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11-12]。

已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但缺乏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微观计量考察,本研究着重考察农民工与市民的空间隔离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之处在于:第一,将空间隔离分解为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分别考察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这种影响在不同规模城市和不同年龄农民工之间的差异;第二,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变量分别通过多指标因子分析测度融入程度以及通过自我身份认同、城市定居意愿等代理变量替代处理。

一、空间隔离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空间隔离及其分解

关于空间最早可追溯到美国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认为其在空间表征上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群体分居于城市不同的空间,即空间隔离为居住隔离,并从主动隔离和被动隔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而本研究所指的空间隔离主要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城市空间上的分隔程度。借鉴景晓芬的研究[13],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空间上的隔离分解为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①隔离三个方面。

1. 居住空间隔离。受居住、交通等生活成本的综合考量,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空间隔离往往表现为与城市居民的隔离,多数农民工集中居住于"城郊村"、"城中村"以及工作场所等特定区域,与城市市民没有交往,即使逐渐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但由于收入、身份等先天禀赋差异,农民工可能会跟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居住融合,但与主流市民群体仍存在居住隔离。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农民工居住状况是否与市民融合作为衡量居住空间隔离的标准,具体操作是根据农民工城市居住类型不同,将其居住状况划分成两类,一类是与市民居住融合,另一类是与市民居住分隔。

2. 职业空间隔离。职业空间往往指个体的工作空间,一般表示为工作区位或工作场所,由于本研究考察职业空间的目的是测度农民工与市民在工作空间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以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从事相同单位工作为衡量其职业空间隔离,即比较城市居民是否与农民工在同一个单位(岗位)工作,具体操作是用所在单位员工中农民工的比例来代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职业隔离程度,单位中农民工比例越低,表示农民工职业空间隔离程度越低。

3. 社区空间隔离。社区空间是农民工城市居住空间的延伸,也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流沟通的重要空间[13]。本研究中对社区空间隔离的测量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农民工居住社区是否有公共设施以及农民工利用公共设施的情况;二是农民工是否参与所在社区组织的相关活动,从上述两个层面来测度其与城市居民的社区空间隔离。具体操作中农民工不参与社区活动或者没有公共设施以及即使有公共设施也不使用均认为其与城市居民社区存在空间隔离。

(二)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

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居住空间的隔离,减少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体验,其生活方式难以得到改变,生活质量也很难提升,而对于农民工而言,拥有更多的城市体验是其获得"现代性"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1]。居住条件的改善、与市民居住

① 在景晓芬的研究中将其分解为城市公共空间[13],但公共空间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含的内容相对广泛,城市居民消闲、娱乐、运动的公共场所都可以定义为公共空间。本研究受问卷限制,将城市公共空间界定为社区空间进行研究。

融合，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个人效能感，既促进其对城市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也会增加其在城市生活的信心，进而促使其在城市定居、融入。第二，职业空间的隔离，减少了农民工与市民共同工作的机会，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流、学习的可能性降低，影响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提升与就业相关信息的获取，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职业阶层的提升以及向正规就业部门的转换。职业阶层的固定又反过来减少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同工作的机会，并最终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能力。第三，社区空间的隔离，减少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日常交流沟通的机会，因为即使农民工与市民居住隔离，仍可通过社区活动增加与市民的接触交流。同样，即使农民工与市民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由于社区活动对农民工的排斥，其仍会成为一个孤立的群体，不利于农民工城市体验的获得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终不利于农民工城市的融入。因此，无论是居住空间、职业空间还是社区空间，农民工与市民群体的隔离都会不利于农民工城市融入。

二、农民工城市空间隔离状况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劳动力转移团队 2014 年进行的“辽宁省农民工社会调查”，共获得 1231 个样本。调查涉及沈阳、锦州、阜新、开原、昌图和台安 6 个城市。基于研究的需要，首先根据农民工城市务工期间居住地点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了务工时回家居住的样本。在此基础上，又剔除了工作单位农民工比例、社区公用设施等重要变量存在信息缺失和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是 923 个。

从农民工年龄构成来看，老一代农民工比例为 50.33%，略高于新一代农民工；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农民工的比例高于女性农民工；样本中已婚的农民工比例为 64.08%；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 7－9 年，占到样本总数的 63.32%，10－12 年的比例为 19.54%，另有 17.14 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 6 年及以下；从农民工从事职业①来看，从事工商服务的比例最高，达到 25.55%，其次是低技能工，比例为 21.83%，其余依次是力工/零工 21.07%、高技能工 19.87% 和小业主管理者 11.68%。上述样本特征与国内农民工的基本情况相符。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指标	类别	比重%	指标	类别	比重%
年龄	老一代	50.33	婚姻状况	未婚或离异	35.92
	新一代	49.67		已婚	64.08
性别	男	56.11	职业	力工/零工	21.07
	女	43.89		低技能工	21.83
受教育程度	0～6 年	17.14		高技能工	19.87
	7～9 年	63.32		工商服务	25.55
	10～12 年	19.54		小业主管理者	11.68

（二）农民工城市空间隔离现状

从农民工城市居住类型来看，比例最高的是单位的集体宿舍，共有 283 个样本，占样本总数的 30.90%，其次是自己购房居住，占到样本总数的 28.71%，其余依次为租房居住、工地工棚、亲戚家

① 在实际调研问卷中农民工的职业类型被划分为 12 类，为分析方便，将力工与零工归为一类，将服务员、销售人员和小摊贩（无固定地点小业主）归为工商服务者，将固定店铺小业主、各类管理人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归为小业主管理者。

和生产经营场所,比例分别为25.87%、2.95%和1.42%。根据前文对农民工城市居住空间隔离的界定以及对居住类型的划分①,最终发现527个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居住融合的样本,其比例为57.53%,而42.47%的农民工存在与市民居住空间隔离。

所在单位农民工的比例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职业隔离程度,从样本中所在单位农民工比例来看,农民工比例在25%及以下的仅有54个样本,占样本总数的5.9%,所在单位农民工比例在50%以上的样本占到79.14%,其中有312个样本所在单位全部为农民工。这一结果表明由于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体制尚未打破,农民工很难上升到城市正规就业市场,造成就业过程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就业隔离程度较高。

农民工居住地周边有广场、绿地、免费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的样本有385个,占42.03%,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居住地周围没有相应的公共设施。通过广场、绿地和健身器材的使用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一结果意味着农民工居住地公共设施缺失会减少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相处机会,进而减少两类人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从数据统计来看,仅有10个样本即1.14%的农民工经常参加所在社区活动,另有43个样本偶尔参加社区活动,虽然知道社区有活动但从不参加的比例为9.88%,而不知道社区有此类活动的比例高达84.11%。从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即使农民工与市民的居住空间融合程度较高,但参加所在社区活动的比例极低,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工与市民群体间的交流与互动。

表2 农民工城市空间隔离状况

指标	频数	比例%	指标	频数	比例%
城市居住状况			周边是否有公用设施		
与市民隔离	389	42.47	有	385	42.03
与市民融合	527	57.53	没有	531	57.97
单位农民工比例(%)			社区活动参与		
1~25	54	5.9	经常参加社区活动	10	1.14
26~50	137	14.96	偶尔参加社区活动	43	4.88
51~75	425	46.39	知道但从不参加	87	9.88
76~100	300	32.75	不知道有此类活动	741	84.11

(三)空间隔离与城市融入的交互分析

从农民工城市空间隔离与城市融入的列联分析来看,与市民居住融合的农民工认同"城市人"身份的比例高于居住空间隔离者近20个百分点。同样,居住融合的农民工愿意定居务工城市的比例高出居住空间隔离者27.59%。从务工单位农民工比例来看,随着所在单位农民工比例上升,农民工"城市人"身份认同和愿意定居务工城市的比例逐步降低。从社区空间隔离与城市融入的交互分析来看,有公共设施及使用设施或参加社区活动的农民工"城市人"身份认同和愿意定居务工城市的比例高出社区空间隔离状态的农民工近15.92%和22.49%。上述结果表明,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会阻碍农民工"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和务工城市定居意愿,但空间隔离是否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因果关系,尚需严谨的计量分析进行验证。

---

① 考虑到农民工与市民居住融合程度衡量的难度,本研究根据农民工城市居住类型,将购房、租房、借住亲戚家等类型视为与城市居民居住融合;将居住工地工棚、集体宿舍、生产经营场所等视为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隔离。

② 对于部分没有工作单位的样本处理方式如下:从事零工和力工的农民工样本,从实际调研来看,无论是沈阳、锦州和阜新等大中城市,还是开原、台安等县级城市,从事上述两类职业的均为农民工,因此即使从事零工和力工的农民工没有固定单位,但其单位农民工比例统一处理为100%。对于小摊贩(无固定地点小业主)处理也同上。

表 3　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列联分析　　（单位：%）

指标	农民工身份认同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城市人	农村人	愿意定居	不愿意定居
全部样本	21.22	78.78	62.66	37.34
居住隔离情况				
居住隔离	9.49	90.51	46.79	53.21
居住融合	29.92	70.08	74.38	25.62
单位农民工比例（%）				
1～25	42.55	57.45	75.93	24.07
26～50	25.58	74.42	75.18	24.82
51～75	26.67	73.33	69.72	30.28
76～100	17.58	82.42	57.47	42.53
社区隔离情况				
有公用设施或参与社区活动	30.29	69.71	75.31	24.69
无公用设施或不参与社区活动	14.37	85.63	52.82	47.18

三、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一）变量界定与模型选择

模型的因变量是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有研究对于城市融入的衡量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因子分析等进行多指标评价，获得最终的城市融入程度值；另一个是通过相关的代理变量作为城市融入的衡量指标，这里首先采用第二种方式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行量化。选择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对当前务工城市的定居意愿来代表其城市融入。为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分别以农民工身份认同（城里人赋值为 1；农村人赋值为 0）、务工城市定居意愿（愿意定居赋值为 1；不定居赋值为 0）以及同时满足愿意定居和自己是城里人作为融入，其余作为未融入三种因变量处理方式进行回归。

核心的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空间隔离，按照前述界定，将空间隔离分解为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并分别用居住状况、单位农民工比例和参与社区活动作为隔离程度的代理变量。此外，模型还加入了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累计务工时间、是否有亲戚朋友等作为控制变量。关于模型变量的定义及描述统计见表 4。

表 4　变量定义和说明

变量名称	定义与取值	均值	标准差
居住状况	1 = 与市民居住融；0 = 居住隔离	0.58	0.49
农民工比例	所在单位农民工比例：%	77.79	25.60
社区状况	是否参与社区活动：1 = 是；0 = 否	0.06	0.23
性别	性别类别：1 = 男，0 = 女	0.56	0.49
年龄	年龄：岁	36.01	11.84
婚姻状况	婚姻：1 = 已婚，0 = 未婚	0.64	0.48
受教育程度	年	8.59	2.28
务工时间	年	9.86	7.81
月收入	最近一份工作月收入：元	2763.53	1622.51
亲戚朋友	务工城市是否有亲戚朋友：1 = 有，0 = 无	0.75	0.43

由于因变量农民工城市融入为取值0和1的二值数据,研究选用Logit模型来计量检验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具体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形式如下:

$$pr(\text{integrate}=1 \mid isolate, X, \varepsilon_i) = \frac{\exp(\alpha + \beta isolate + \sum_i \kappa_i X_i + \varepsilon_i)}{1 + \exp(\alpha + \beta isolate + \sum_i \kappa_i X_i + \varepsilon_i)}$$

上式中 *isolate* 为研究所要考察的核心变量即空间隔离,分别用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来表示,X是控制变量,包括表中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累计务工时间、是否有亲戚朋友等。ε_i 是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二)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 logit 回归

1. 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5是模型基于全部样本的估计结果,根据似然卡方统计量的值,模型整体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分别设定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身份认同以及同时具有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人身份认同三种情况,分别进行回归。同时,先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而后加入重点考察的空间隔离变量,R^2 值都得到提升,表明加入空间隔离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提升。

(1)空间隔离变量。居住空间隔离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居住隔离会显著阻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居住融合的农民工其城市融入的概率将增加14.23%。其原因可能是通过与市民居住融合可以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交流沟通的机会,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城市生活体验,促进农民工城市生活行为习惯的改变,增强城市适应性。农民工职业隔离变量也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系数符合为负,表明单位中农民工比例越高即职业隔离程度越高,其城市融入的概率越低,农民工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融入的概率将降低0.09%。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高的职业隔离表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就业差异,即多数农民工处于非正规就业状况,另一方面职业隔离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学习交流机会减少,不利于其技能提升、职业流动。社区空间隔离只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有助于其城市定居,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以及两者合一考察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部分农民工居住地没有社区,也没有相应的社区公共设施,同时即使有社区但样本中参与社区活动的农民工比例偏低。

(2)控制变量。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累计务工时间、月收入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均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上述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进一步考察其系数符号,可以发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累计务工时间越长,务工城市中有亲戚朋友三项变可以显著促进其城市融入。而月收入的系数符号为负,表明收入增加反而不利于其城市融入,可能是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工对于城市定居、融入的考量更加注重非经济因素所致。

2. 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代际与城市规模差异

为了考察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代际和城市规模差异,分别按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类别进行分组回归,并将空间隔离这一核心变量对城市融入影响的结果报告如表6所示。从居住隔离来看,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该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系数符号同为正,表明居住隔离都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从边际效应来看,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原因可能是除了通过与市民为邻增加交流机会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拥有更多与市民交流沟通的途径。同样,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居住空间隔离都会显著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同时中小城市的影

响程度要大于大城市。职业空间隔离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而言，职业空间隔离程度较低，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实现职业流动以及与市民就业交流的途径与机会多。而社区空间隔离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无论是代际还是城市规模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5　Logit 回归结果（全部样本）

变量	农民工身份认同		农民工城市定居		农民工城市融入	
	回归(1)	回归(2)	回归(1)	回归(2)	回归(1)	回归(2)
性别	0.0022	0.0056	-0.1049***	-0.0966***	-0.0102	-0.0059
	(0.0294)	(0.0281)	(0.0361)	(0.0372)	(0.0235)	(0.0201)
年龄	0.0005	0.0004	-0.0056***	-0.0049**	-0.0007	-0.0006
	(0.0016)	(0.0016)	(0.0019)	(0.0021)	(0.0013)	(0.0012)
婚姻状况	0.0424	-0.0016	0.0456	-0.0351	0.0631**	0.0140
	(0.0325)	(0.0338)	(0.0427)	(0.0444)	(0.0246)	(0.0238)
受教育程度	0.0270***	0.0220***	0.0217***	0.0148*	0.0196***	0.0134***
	(0.0067)	(0.0064)	(0.0079)	(0.0083)	(0.0054)	(0.0047)
务工时间	0.0094***	0.0078***	0.0081***	0.0044*	0.0080***	0.0061***
	(0.0020)	(0.0019)	(0.0026)	(0.0027)	(0.0016)	(0.0015)
月收入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亲戚朋友	0.0937***	0.0802***	0.1885***	0.1679***	0.0919***	0.0714***
	(0.0284)	(0.0278)	(0.0401)	(0.0422)	(0.0218)	(0.0197)
居住状况		0.1419***		0.2547***		0.1423***
		(0.0288)		(0.0391)		(0.0229
农民工比例		-0.0013***		-0.0020***		-0.0009**
		(0.0005)		(0.0007)		(0.0003)
社区状况		-0.0685		0.1105***		-0.0264
		(0.0444)		(0.0361)		(0.0338)
样本量	867	867	916	916	916	916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0949	0.1312	0.0968	0.1594	0.1278	0.1858

表 6　空间隔离影响融入的代际与城市规模比较

变量	组别	边际效应	标准误	组别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居住状况	老一代	0.1707***	0.0289	大城市	0.1183***	0.0307
	新生代	0.1108***	0.0344	中小城市	0.1590***	0.0345
农民工比例	老一代	-0.0010**	0.0006	大城市	-0.0009***	0.0004
	新生代	-0.0005	0.0004	中小城市	-0.0010	0.0006
社区状况	老一代	0.0488	0.0904	大城市	0.0059	0.0481
	新生代	-0.0517	0.0322	中小城市	-0.0514	0.0513

四、融入程度与分位数回归

由于前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研究是通过身份认同、城市定居等代理变量作为衡量融入

的,为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比较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农民工的影响,借鉴其他学者经验,通过多指标分析得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程度,进而以得出的城市融入程度作为因变量,考察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测度

从以往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测度来看,不同的学者虽然采取的指标不尽相同[14-17],但对于城市融入的分解较为一致,多从经济、行为和心理三个方面考察。本研究同样从经济融入、行为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方面选取相应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得出每个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值,选取的具体指标及其说明如表7。

表7 城市融入指标说明

指标	变量	变量的说明
经济融入	月收入	1=0~1000;2=1001~1500;3=1501~2000;4=2001~2500;5=2500以上
	月消费额	1=0~500;2=501~1000;3=1001~1500;4=1501~2000;5=2000以上
	职业类型	1=力工;2=低技能工;3=高技能工;4=工商服务;5=小业主管理者
行为融入	娱乐活动数	1=0~1项;2=2项,3=3项,4=4项,5=5项以上
	是否有保险	有保险=1,无保险=0
	经常联系朋友	在城市=1,在农村=0
心理融入	身份认同	城市人=1,农村人=0
	工资满意度	1=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工作满意度	1=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居住满意度	1=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对上述指标做KMO检验,KMO值为0.6103,bartlett检验值显著,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考虑到选取的因子主要用于对农民工融入程度进行评价,为了充分解释方差变量,选取特征值小于1的因子不会造成显著差异,因而研究选取3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85.78%。进一步利用因子特征值确定所选因子的权重,并通过因子得分函数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值,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H=\frac{\sum\lambda_i H_i}{\sum\lambda_i}=\frac{\lambda_1}{\sum\lambda_i}H_1+\frac{\lambda_2}{\sum\lambda_i}H_2+\frac{\lambda_3}{\sum\lambda_i}H_3$$

上式中λ_1、λ_2、λ_3为权重,研究中以对应提取的3个因子特征值,H_1、H_2、H_3是3个因子的值,H为综合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值,介于-1到1之间,值越大,表明融入程度越高,值越小,说明融入程度越低。

(二)空间隔离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分位数回归

将通过因子分析测得的城市融入程度值作为因变量,继续考察空间隔离的影响。由于传统的OLS回归方法只能得到相关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期望值的影响,无法更多的反映城市融入程度分布规律的影响[15],研究拟采用Koenker and Bassett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该方法由于从不同分位数上考虑问题,分析结果也更加全面和深入。运用stata12.0软件进行分位数回归,因篇幅所限仅列出空间隔离变量在不同分位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农民工职业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不同分位上均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从其系数来看,对于两端分位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处于0.5分位,即职业空间隔离对城市融入呈现"U型"。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融入程度较低的农民工而言,通过就业技能提升与就业信息获得进而提升就业质量的愿望更为迫切,而职业隔离显然不利于其通过与市民共同工作获得技能(经验)及就业信息。而对于融入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冀望通过与市民共同工作拓展自己的社会交往,使得职业空间隔离对高

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影响较大。居住空间隔离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仅在 0.5、0.75 和 0.9 分位影响显著，并且影响强度随着农民工融入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而在 0.1 和 0.25 分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居住空间隔离对融入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存在显著影响。说明对于低融入程度的农民工，“与市民居住融合”、“促进与市民的交流”对于其城市融入影响不大，推进居住融合针对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效果更佳。社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分位上均影响显著，从其影响系数来看未呈现相应的规律性变化。

表 8　城市融入程度的分位数回归

	0.10	0.25	0.50	0.75	0.90
居住状况	0.0099	0.0688	0.0695**	0.0704**	0.1463**
	(0.0503)	(0.0434)	(0.0343)	(0.0511)	(0.0685)
农民工比例	−0.0042***	−0.0021***	−0.0014**	−0.0031***	−0.0032*
	(0.0007)	(0.0006)	(0.0006)	(0.0008)	(0.0017)
社区状况	0.3367***	0.2919***	0.3213***	0.3139***	0.2606*
	(0.0996)	(0.0662)	(0.0708)	(0.0594)	(0.1375)

五、空间融合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

本文利用辽宁省农民工 2014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对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将空间隔离分解为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基于所构建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考察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并比较不同规模城市、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影响差异；其次，在测度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农民工的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

（1）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负相关，即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区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比较不同规模城市和农民工代际之间空间隔离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发现居住空间隔离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小城市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大城市；职业空间隔离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显著，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不显著；社区空间隔离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无论是农民工代际还是城市规模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通过因子分析测度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运用分位数回归进行检验，发现在融入程度的不同分位，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均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而居住空间隔离对于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有显著影响。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需要关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空间隔离，并着重从居住空间、职业空间和社区空间降低两类群体间的隔离程度，通过空间融合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体包括：

（1）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工获得城市住房保障的门槛。引导企业以房租补助的方式鼓励农民工自主租房，促进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改善农民工城市居住条件，增加农民工正向的城市体验。

（2）改革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促进部分就业岗位向农民工平等开放，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通过就业岗位的开放与就业机会平等获得，减少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隔离，促进就业融合。

（3）向农民工开放各类社区公共资源，鼓励农民工积极参加社区各类文化活动，增加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

参考文献:

[1]陆影. 社会空间视域下的"城中村"隔离问题[J]. 学术研究,2015(12):49-55.

[2]BURGESS E W. The Growth of the C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 Urban Ec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3]DEANNA L PAGNINI, S PHILIP MORGAN. Intermarriage and Social Distance Among U. 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0, 96(2):405-432.

[4]TIMM D W G. The Urban Mosaic: Towards a Theory of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M].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5]刘玉亭.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6]林顺利,张岭泉. 社会政策的空间之维——以城市贫困的空间剥夺为例[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63-68.

[7]袁媛,吴缚龙. 基于剥夺理论的城市社会空间评价与应用[J]. 城市规划学刊,2010(1):71-76.

[8]段成荣,王莹. 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6):4-6.

[9]李志刚,刘晔.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J]. 地理学报,2011(6):785-792.

[10]张子珩,杨莉,雷敏. 南京市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5-8.

[11]甘满堂,王岩. 农民工居住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郊村[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23-126.

[12]卢国显. 空间隔离与集中化生存方式: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3):71-76.

[13]景晓芬. 空间隔离及其对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以西安市为例[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14]郭江影,周密,张广胜,等. 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机理与实证——以辽宁省为例[J]. 南方人口,2016(2):36-48.

[15]何军.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J]. 中国农村经济,2011(6):15-25.

[16]彭安明,朱红根,康兰媛.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5):55-60.

[17]龚文海. 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及其城市融入状况测度[J]. 城市问题,2014(8):74-80,100.

Space Segregation and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QI Di-ming[1], ZHANG Guang-sheng[2]

(1. *Institute for Economy & Social Development*, *Quzhou University*, *Quzhou* 324000,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Study the effects on urban integration from space isolation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occupation segreg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effects o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to old peasant worker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re greater than which of the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nd big cities, and community space isolation has not significant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In additio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high integration degree migrant workers by quantile regression; occupation segregation and community space iso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different integration level migrant workers.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we should reduce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ccupation segregation and community space isolation, and to promote urban integration by space integration.

Key Words: space segregation; urban integration; migrant worker; citizen identity; aspiration of settle down